

减少高考加分是给公平加分

高考“唯分数论”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公平,高考加分政策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公平。正所谓“兴一利生一弊”,任何公共政策都是利弊相依的,关键要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。

一家之言

晏扬

3月5日,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河北代表团全团会议上表示,明年将取消现有高考中四分之三左右的加分项目,只保留少数民族、烈士子女等少量加分项目。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好消息。若用一句话概括其意义,那便是:减少高考加分,就是给高考公平加分。

必须承认,高考加分政策有着良好的初衷:“唯分数论英雄”有着显而易见的缺陷,它只能反映一名考生对书本知识的掌握程度,却无法全面反映一名考生的综合素质,更无法展现一些考生的特长。在“唯分数论”导向之下,应试教育大行其道,素质教育步履维艰。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、改变这种导向,高考才有了各种加分政策,以期纠正应试教育之偏,结出素质教育之果。

然而,播下的是龙种,收获的可能是跳蚤。看上去很美的高考加分政策,在实施过程中却逐渐异化、变味、走形,乃至与初衷南辕北辙。一是导致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、钱权交易,各种丑闻层出不穷,各种神通花样翻新,严重损害了高考的公信力;二是有些加分项目反而强化了应试教育——当培养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只是为了获得高考加分,它就会异化为更加疯狂的应试教育,增加了学生和学校的负担;三是对农村学生尤其是贫困地区学生不公平,因为他们没条件、没机会学习各种特长,很难获得高考加分,致使重点高校中农村生源比例偏低,城乡教育鸿沟越拉越大。

正所谓“兴一利生一弊”,任何公共政策都是利弊相依的,关键要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。就高考加分政策而言,其利在于可在一定程度上破除“唯分数论”,让综合素质较高或特长生获得优先上大学的机会,但相比而言,其引发的种种弊端更加严重和普遍,更加突出和刺眼——如果说高考“唯分数论”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公平,高考加分政策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公平,那么现在的问题是,不仅更高层次的公平如同镜花水月,连较低层次的公平都屡屡遭到破坏,这自然让人们无法容忍,宁愿回归到“分数面前人人平等”的较低层次公平。

在这个意义上,大幅度削减高考加分,并非表明高考加分政策一无是处,更不是否定素质教育,而只是

是利弊权衡的结果,是“两弊相权取其轻”。尤其让人欣慰的是,这次削减高考加分项目没有拖泥带水,而是大刀阔斧、快刀斩乱麻,现有高考中四分之三左右的加分项目都将被取消,对很多加分项目不惜采取“一刀切”。这是维护高考基本公平的需要,也是对民众呼声的诚恳回应,显示了中央提振高考公信力的决心。

减少高考加分,就是增加高考公平,尽可能压缩加分项目,就相当于将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、钱权交易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小。这是一种“釜底抽薪”的办法,它比加强监督更有效,比事后究责更管用。高考公平事关千万考生的切身利益,关乎无数家庭的喜怒哀乐,清理、规范高考加分意在维护高考基本公平,而素质教育只有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才能开花结果。

“增赤字保减负”应得到响应

大家谈

谭浩俊

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,2016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.18万亿元,比2015年增加5600亿元,赤字率提高到3%。适度扩大财政赤字的主要目的,就是用于减税降费,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。

以增赤字来保减负,是个新提法,即便近两年赤字都在扩大,也没有明确提出用扩大赤字的方式来减轻企业负担。新提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央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,说明了中央已经在下决心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、眼前与长远、局部与整体的关系。只有处理好这些方面的关系,中国经济才能够真正步入健康、有序、可持续发展轨道。

事实也是如此,在经济形势较好、宏观环境较优的情况下,企业还可能在沉重的负担面前艰难生存。而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环境的恶劣,特别是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协调,这些负担就有可能以乘数效应的方式,使企业难以生存。相反,这些资金到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手中,却又产生不了效率,甚至会成为挤压经济、挤压企业的负能量。

中央以增加赤字的方式来给企业减负,可以说拿出了最大的诚意,提供了最大的支持。纵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,也足以说明中央在这方面的决心和信心。接下来需要做的,一方面,就是要确保这些政策落到实处,能够全部转化成企业的发展动力,而不是赤字增加了,负担却没有减轻,而是被地方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截留了。另一方面,除了中央拿出给企业减负的行动来之外,地方及其政府机关、金融机构等如何拿出行动来呼应中央的决策,也出台一些减负政策和措施,尤其是银行,能否把融资成本降下来,对企业能否走出困境的影响是相当大的。

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,已经没有什么退路,唯一的办法,就是齐心协力、共渡难关。中央已经用增加赤字的方式来减轻企业负担、为企业尽快走出困境提供支持和帮助了,地方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出更多行动来呢?银行又有什么理由不把融资成本降下来呢?再者说,企业不活,经济如何能活?企业不兴,政府财源何来?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道理。

以增加赤字来给企业减负,彰显了中央发展经济的决心和信心,这样的决心和信心,理应有效传递到地方政府,传递到金融机构,得到方方面面的响应。任何的梗阻或短板,都有可能化解以赤字换来的减负之力。(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)

公民论坛

对“提高挂号费”不该立场先行

王丽美

3月5日,在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小组会议上,全国政协委员、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“号贩子”问题,指出“号贩子”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,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,降低药费检查费,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。(3月6日中新网)

在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下,刘玉村委员却要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,惹得不少网友愤慨不已。然而,如果将刘玉村委员的发言完整、冷静地看下来,却不难发现他的思路是有道理的。就拿轰动一时的“女孩痛斥‘号贩子’”来说,有个关键点是女孩要挂的是专家号,并非普通号。所谓看病难,主要集中在找专家难上,有限的专家资源和庞大的就医需求严重不匹配,实则是优质医疗资源短缺和供需的不匹配,“号贩子”正是抓住了这种“商机”。

事实上,不仅是基层医院门可罗雀,即便是著名的北大医院、协和医院,也有很多医生坐一上午没几个病人,仅仅是这些医生不是专家,知名度不够,而不是水平不够。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,可以有效分流患者,按照病情逐级就诊,符合病人就医、医生看病的治疗规律。

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,也是发达国家的经验,我国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都会提到“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”,那什么是符合医疗行业特点呢?就是以较高的价格“肯定”专家的职业价值。挂号费高了,小病挂专家号的就少了,“号贩子”的风险成本大大增加,不仅优化了医疗资源配置,也比较符合分级诊疗的初衷。反之,儿科等科室的医生稀缺,就是由于价格和价值失调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结果。

面对这一敏感问题,不少人的第一反应便是责问:提高挂号费就能解决“号贩子”问题?需要看到,刘玉村委员也指出了“号贩子”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,并提出了药品和服务价格“三升三降”的建议。假如这些建议得到论证并落实,“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”就不会招致这么大的非议了。

总之,既不能漠视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痛点,也不能无视医生群体的专业声音和职业诉求,搭建公平公开的意见平台,社会舆论以足够的理性来寻求“最大公约数”,才是解决难题的关键。最怕的就是立场先行,揪住某个点或某一句话一通棒喝。

不把“天价鱼”视作偶然值得点赞

毛建国

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在黑龙江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上,回应之前社会热议的“天价鱼”事件时说,“天价鱼”事件不是偶然的,说明一部分基层干部和市场主体,在树立接受监督,特别是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方面的意识还有差距。“此外,这也说明黑龙江省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经营者,在树立以法律、制度、规则和信用为核心的市场意识还有明显差距。这件事情上集中表现出来了。”(3月6日新华网)

步入“两会时间”后,我们看到,不仅是“天价鱼”事件,还有其他热点事件引起了关注。比如,此前社会关注的“女孩怒斥‘号贩子’”事件,就有很多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谈起,连卫计委主任李斌也主动提及,并且向这位女孩表示感谢。不回避问题,不拒绝热点,这样的两会风气,是人们希望看到的。

如同任何一起公共事件,“天价鱼”事件的发生,无论是对当地城市形象,还是对旅游行业形象,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坏事,当地对这一事件的反思及问责,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但是,事物是处在发展中

的,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阻止负面事件的发生,但可以吸取经验教训,影响事件的进程。其实,很多热点事件都已经过去了,之所以到了两会上被再次提起,也是通过两会这个重要平台,传递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期望。无论是对“天价鱼”的提问,还是对“天价鱼”的回应,都体现了这一点。

诚然,一些问题曝光和报道后,可能不太好看,但是,问题隐藏在下面,如果不把伤疤揭起来,不对伤口用药,就永无痊愈的可能。而现在,“天价鱼”事件的发生,充分暴露了当地“一部分基层干部和市场经营主体,在真正理解以法律、规则、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意识方面还有一定差距”。看到了问题,找到了不足,拿出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勇气,那么学费就交得有价值。

看到了偶然事件背后的必然因素,对“天价鱼”事件的反思,应该是说到点子上了。今年的两会上,很多代表委员对热点事件的回应,都体现了对偶然和必然、坏事和好事的辩证认识。有了正确的认识,才有改变的可能,这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。

本版投稿邮箱: qilupinglun@sina.com

“教授做检讨”贵在解剖自己

读者来信

笔者在齐鲁壹点客户端上看到一则报道,说是74岁的老教授,因为看错了课表没有来给学生上课,写了检讨书在学生面前做检讨,还提出因为无故旷工要求停掉自己本学期的劳务补贴。因为这一举动,老教授不但取得了学生的原谅,还得到了学生、教职工乃至校领导的由衷敬意,个中原因,颇值得我们玩味。

在我看来,老教授之所以让人尊敬,最大的原因在于勇于“解剖”自己。“我可以狡辩,缺课不是有意的,是看错了课程表……实则不然,为什么我五十年从教没有出现过这种低级错误,恰恰在刚刚退休时就出现了呢?正是因为退休让自己松懈了……”这样的反思,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。

面对错误,有的人会推卸责任,有的人会死不承认,有的人会以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。就拿看错课表这件事来说,或许

发生在有的人身上,就会想办法瞒过去,瞒不住了也要找领导沟通,大事化小小事化了。我看到网上就有人评论说,这点小事根本没有必要“闹大”,公开检讨反而显得矫情。

这种反应似乎也说明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现实生活中埋怨他人的多,主动给自己纠错的少。老实实在承认错误,主动承担起责任,反倒成了“稀缺品”。的确,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犯错误,但面对错误时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,若是人人都“自以为是”,将会是怎样的社会风气!可以说,“教授检讨”是应对错误的最佳范本,不但用真诚化解了危机,还为自己赢得了尊敬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,老教授做检讨也是一堂课,比普通的文化课更有教育意义。面对错误如何应对,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与担当。我想,该向那位老教授学习的,可不只是大学里的学生和教师。(程贵涛)



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2号

邮编 250014

传真 (0531) 86993336 86991208

报纸发行 (0531) 85196329 85196361

报纸广告 (0531)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

差错投诉 96706

发行投诉 (0531) 85196528

邮政投递投诉 11185

即时互动平台



“壹点”官方APP



新浪官方微博 weibo.com/qlwb



齐鲁晚报微信 qiluwanbao002